

读书者说

# 以卫星为“眼” 瞰大美中国

## ——评《60万米高空看中国》

□ 何平

如果站在60万米高空,俯瞰祖国壮美山川和秀美家乡,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手中的这本《60万米高空看中国》是新华社与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携手,将互联网数字技术与纸质图书有效嫁接,新媒体与传统出版物优势互补,应运而生的一本好书。该书以“一省一脉,一地一经纬”为主线,以卫星图片为基础,用图像和文字串联起一幅幅气势磅礴、美不胜收的画卷。既是一场大美中国的发现之旅,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探索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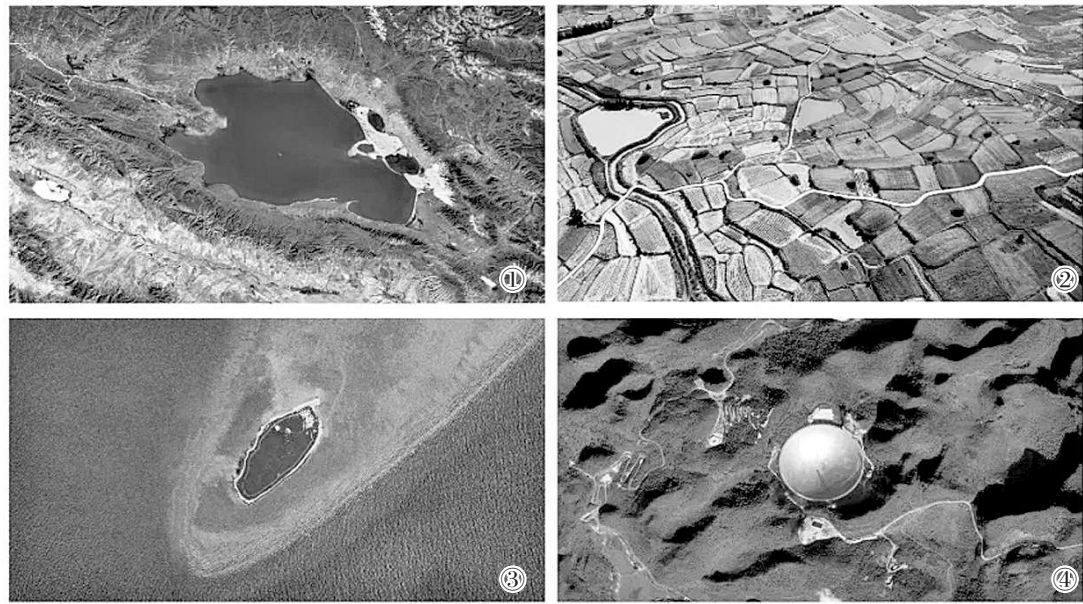
### 从卫星视角切入,看懂新中国70余年的宏观变迁

阅读《60万米高空看中国》,首先不能忽视的是之所以选择“60万米”遥感技术高度是为了实现对70年新中国沧桑巨变这一宏阔的时代主题进行深度、细节的观照和把握的初心。

图书《60万米高空看中国》的母本是2019年9月至11月新华社推出《60万米高空看中国》系列报道。这个报道缘起于2019年年初的一次新中国成立70周年报道策划,新华社社长刘思扬提出能否运用遥感卫星技术,从卫星这个独特视角切入,用系列短视频的形式,全景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各地的发展变迁。随后,新华社运用卫星资源,聚合增强现实技术和遥感卫星技术,向北向南,由东到西,捕捉全国34个省市区70年来物换星移的巨大进步和沧海桑田的宏观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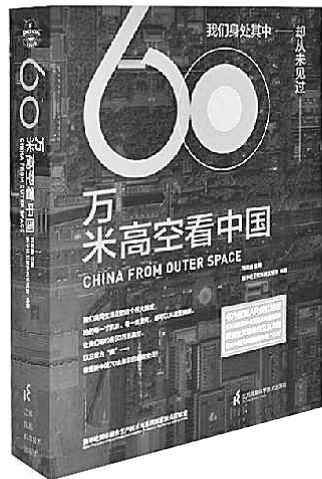
事实上,正是基于遥感卫星技术如多光谱、合成孔径雷达(SAR)等手段,卫星新闻才成为可能。就像新华社卫星实验室程瑛所指出的,和传统新闻报道不同,卫星新闻可以超越肉眼辨识,实现大空间尺度——用较低成本了解大面积范围内发生的事情,以及大时间跨度,利用国内外数据,可以向前追溯三四十年来,详查一个长时间周期内的变化。《卫星新闻:为遥感应用敞开新空间》70年社会变迁是60万米高空物理高度相契合的思想高度,或者说主题。因此,在地景的选择上,《60万米高空看中国》,虽然不乏传统意义的风景,像漠河北极村、月牙泉、日月潭拉鲁岛、山西老牛湾以及名胜,如同云冈石窟、嵩山少林寺、都江堰、平遥古城、西安大雁塔、敦煌莫高窟等,但本书更值得注意的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等历史维度重新发现和定义中国地标,讲述属于我们时代的中国故事。

如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60万米高空看中国》的历史线索,比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60万米高空俯瞰:①青海湖;②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③海南省三沙市西沙永乐群岛的晋卿岛;④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的“中国天眼”。

图片均选自《60万米高空看中国》



《60万米高空看中国》刘思扬主编 新华社卫星新闻实验室 编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可以这么说,这本书的创意主体虽然是新闻工作者和技术研究人员,但贯穿全书的是史家的史识。这种史识不但体现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也具体而微到书中的每一个地景的呈现,比如关于丰满水电站,书中选择了1941年拍摄的建设中的丰满大坝和2018年拍摄的丰满水电站原大坝和正在建设的新大坝;比如铁西区,选择了20世纪50年代沈阳铁西区工人新村一角和2007年6月8日拍摄的沈阳铁西区,映照镇,等等。不同时代的图片对勘,读者看到的是近现代流动的中国,变动的中国,不断奋进走向富裕和富强的中国故事。

### 从不同时代的图片对勘,读懂走向富裕和富强的中国故事

可以这么说,这本书的创意主体虽然是新闻工作者和技术研究人员,但贯穿全书的是史家的史识。这种史识不但体现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也具体而微到书中的每一个地景的呈现,比如关于丰满水电站,书中选择了1941年拍摄的建设中的丰满大坝和2018年拍摄的丰满水电站原大坝和正在建设的新大坝;比如铁西区,选择了20世纪50年代沈阳铁西区工人新村一角和2007年6月8日拍摄的沈阳铁西区,映照镇,等等。不同时代的图片对勘,读者看到的是近现代流动的中国,变动的中国,不断奋进走向富裕和富强的中国故事。

# 书写为人民谋幸福的精神史诗

## ——《人民的胜利》创作谈

□ 丁晓平

我一直想为我们的祖国写这样一部作品,告诉我的朋友尤其是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们——我们的祖国多么伟大,不因她的美丽,也不因她的富饶,不因她的辽阔,也不因她的强盛,而因她走过的路多么不易。因为在我的身边,还有许许多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对祖国的历史,是那么的熟悉,又是那么的陌生。

正是怀着这样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十多年前我就开始准备和酝酿,把历史的光芒聚焦于1919年、1949年和1979年这三个特殊的年份,并以它们为中心辐射前后30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努力完成20世纪中国百年历史从觉醒与绽放、崛起与解放到改革与开放的“时代三部曲”,以文学的方式重述我们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理直气壮地书写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精神史诗,《人民的胜利》只是其中的一部。

毫无疑问,在20世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新中国之外,再没有哪个事件在当时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可能,但事后却成为中国历史的必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带领中国人民用

“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又打败了蒋介石,推翻了“三座大山”,成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引人注目的政治成就,塑造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包括我们自己的当代史。这正是《人民的胜利》写作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意义。

新中国到底是如何诞生的?为什么说新中国的诞生是人民的胜利?我知道,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幸运的是,我能够看到众多的革命者给我们留下了十分精彩的回忆录,还有更多的前辈历史学家和作家们给我们提供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是的,不可否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场“农民战争”,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了中国历史,改变了中国农民起义始终兴亡的历史周期率,把农民战争创造为中国人民战争,从而获得了人民的胜利。瞧!农民战争与人民战争,仅仅只有一字之差,但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差别,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新中国的成立,正是人民的胜利最美好、最珍贵、最有力和最不朽的见证。

我始终相信,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是否优秀,最重要的是他和他人的作品是否具有思想。文学创作最能体现功力的就是作家和作品

的思想。优秀的文学家应该是思想家。如何体现作家的思想呢?除了观点、语言之外,作品的结构也是作家思想的体现。就是在这样的思考和研究中,我决定《人民的胜利》从1946年6月的国共内战(解放战争)开始写起,一直写到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于是,全书的结构也水到渠成地建立起来,分别由《前夜》《翻身》《决战》《统战》《外交》《开国》6个篇章构成,每章均分为五个小节,共计50万字,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立体考察以及仰视、俯视和平视的三重视角,从政治、经济、军事、统战、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立体全景式再现新中国成立的创业史、奋斗史,展现中国共产党紧紧团结、依靠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的艰难曲折又波澜壮阔的历程,告诉人们这段人人似乎都知道但又不完全知道的历史。

要见树木,更要见森林。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离不开宏大叙事,必须实事求是地回到历史现场和历史语境当中,完整书写整体的历史和历史的整体。我们必须突破历史的局限,不当事后诸葛亮,不放马后炮,要循着实事求是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在常识中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

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得见多远的未来。说句实在话,我不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作家,或者说我是一个不善于虚构的作家。我认为,对非虚构写作来说,遵守真实性原则是第一要务。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讲故事不是我们的目的,讲故事的目的还是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讲出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精神,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因此,历史写作就要写最有价值的历史,写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

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历史呢?我认为,推动并有利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发展进步和根本利益的历史,就是最有价值的历史。因此,《人民的胜利》讲述的不仅仅是“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的故事,因为“站起来”也不仅仅只是伟大的中国故事,而是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道路、中国力量的深厚蕴藏和具体体现,更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

复兴的伟大精神史诗,是世界的、也是人类的精神史诗,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

相信,读者朋友们已经明白我为什么立志要写这本《人民的胜利》了。希望我以《人民的胜利》的方式和结构来叙述的共和国最初的那段历史,能够给读者朋友在阅读中带来不一样的快乐和思考。有人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更何况,本书所写的故事就是当代史,或者说就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尽管我的写作突破了传统的编年史的路径,但依然还是循着编年史的路径,用心地讲述了一些大历史中的小插曲,让我们既能看清历史长河的主流,也能看见河面上那一朵朵洁白又美丽的浪花……

(作者系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主任)

城、黄浦江两岸的外滩与陆家嘴、香港维多利亚港南岸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与金紫荆广场、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和拉萨西藏会议中心等等。而其中的北京中轴线及其南、北延长线,北京长安街及其东西延长线和高空瞰阅兵三幅画卷,以及武汉火神山医院和武昌方舱医院是全书最能见出主创人员“60万米高空”的用心和命意,予读者震撼的一定不只是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图片,还有背后中国卫星遥感技术的想象。

### 所见是壮美河山,所见是历史与当下,所见是希冀与未来

中国传统观山水方式有三。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的观点说: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书中的俯瞰之姿是古人无法获得的太空视角,若以古意也是携扶摇直上俯瞰万物所能取的浩荡之势。《60万米高空看中国》,312国道上的“天路十八弯”如何穿越横断山脉,连接高原与盆地;朝天门长江大桥如何跨越长江两岸,挽起山水与都市;西江千户苗寨,如何留守着历史、风俗与记忆,借助“60万米高空”的卫星之眼犹在目前。《60万米高空看中国》,从北到南,从东往西观览祖国34个省份,所见是壮美河山,所见是历史与当下,所见是希冀与未来。“我们身处其中,却从未见过”,这里不再是取于丹青的半是视野所及,半是胸中丘壑。“60万米高空看中国”,是当代中国人可能的观看视角。大美中国亦由此生发。这里的美,有农业生态景观之美。红河哈尼梯田“春如翡翠球如金”,处高山流水,傍田园人家。人民利用智慧引山顶之水,育养梯田,与自然和谐共处,是真正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有现代交通奇迹之美。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于多年冻土,生态脆弱,高寒缺氧的环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俯瞰青藏铁路拉萨河特大桥,如白色哈达飞越拉萨河,这是现代的线条,是现代的速度。传统与现代,无论卫星图片中的变迁,实景图片中的记录,未着一言,却深意在焉。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人民的胜利》丁晓平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复兴的伟大精神史诗,是世界的、也是人类的精神史诗,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

相信,读者朋友们已经明白我为什么立志要写这本《人民的胜利》了。希望我以《人民的胜利》的方式和结构来叙述的共和国最初的那段历史,能够给读者朋友在阅读中带来不一样的快乐和思考。有人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更何况,本书所写的故事就是当代史,或者说就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尽管我的写作突破了传统的编年史的路径,但依然还是循着编年史的路径,用心地讲述了一些大历史中的小插曲,让我们既能看清历史长河的主流,也能看见河面上那一朵朵洁白又美丽的浪花……

(作者系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主任)

光明书话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壮族诗人韦其麟是一个独特而值得持续关注存在。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至今,除特殊年代中断十多年外,研究界一直保持着对韦其麟研究的热情,已有上百篇不同类型的论文阐述他,40余种当代诗歌史、文学史著作也辟专门章节评介他。

历史地来看,韦其麟构成了一种可予探讨的诗歌现象。这位早慧的诗人,1953年还是高中生的他就在《新观察》上发表长诗《玫瑰花的故事》,从此步入缪斯的殿堂,多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各类作品集十余部。他的诗歌最为人知的无疑是《百鸟衣》,这既是他的成名作,又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部长篇叙事诗取材自壮族民间传说,以动人的笔触演绎了一对壮族青年男女的爱情和抗争的故事,诗中的主题、人物形象及语言、手法都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该诗最初发表于《长江文艺》1955年6月号,后转载于《人民文学》1955年7月号,1956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各种版本累计发行逾100万册。该诗发表后不久,即有多篇关于它的专论在《文艺报》等刊物上登载,随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科学出版社1962年9月出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63年11月出版)将《百鸟衣》写入了当代文学史。此外,《百鸟衣》还被翻译为近十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可以说,《百鸟衣》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是长诗中的一部经典,正是它确立了韦其麟的诗歌史地位。

正如评论家张燕玲指出:“韦其麟……60年来一直以其高洁的为人和烂漫的诗意成为广西文学的一个精神高度。”韦其麟作为一种诗歌现象所带来的最重要启示,就在于他通过富有创造性的写作,展示了当代诗歌与民族文化、民间资源之间的紧密联系,比如《百鸟衣》就蕴含了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元素,他的其他诗作如《凤凰歌》《莫戈之死》同样如此。由此引发的诸多议题,如当代诗歌的民族性与民间性,少数民族诗歌在当代诗歌中的位置,以及韦其麟本人之于当代壮族乃至广西诗歌的意义等,亟须进行资料和学术上的总结与探究。而刚刚出版的钟世华先生编选的《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韦其麟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可谓正当其时,恰好满足了上述期待。

这部洋洋40余万字的研究论集,包含《韦其麟小传》《研究综述》《访谈·自述·印象》《评论文章选辑》《附录》等部分,综合、立体地展现了韦其麟60余年的人生轨迹、创作历程及其与当代诗歌和其他少数民族诗歌的互动关系,以及围绕这些相关议题展开研究的总体格局和代表性成果。倘若说,韦其麟的亲历者角色和持久创作,让他和其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并见证了当代少数民族的发展历史,能够彰显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某些特征,那么这部论集就是对这些特征的全面把握和集中呈现,兼具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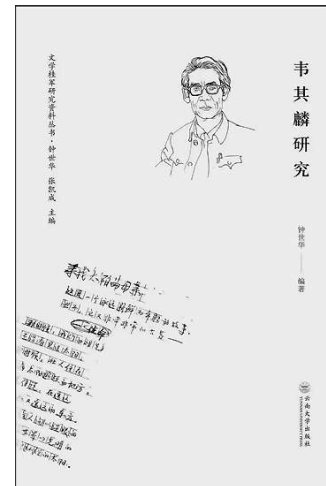
在收录的韦其麟自述文字中,有不少珍贵的个人记忆和值得重视的创作经验,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仍然是他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对“民族特色”为切入点谈诗歌创作的取向。他主张“从民歌的土壤中吸取营养”,是因为“在民歌里,那大胆的带有浪漫色彩的夸张,和那丰富的比喻、起兴、重复,是那样形象、精确、具体、生动和恰到好处,给人的印象是那样强烈、新鲜、明朗。那重叠的章句在反复吟诵时那样深深地引起人们内心的共鸣”;但他反对在寻求民族特色时的某些偏颇做法,即“以一种猎奇的心理和态度专门注意那些奇风异俗,或在服装服饰上着眼”。这就显示了一种辩证思维和更开阔的视野。

论集所收录的代表性论文提供了多种探入韦其麟诗歌的角度和方法,也体现了60余年韦其麟研究的更迭与创新,从早年的主题学和阶级分析,到近年来的民俗学、神话学、修辞学、“原型批评”等,使得韦其麟研究渐趋多样化。

# 高洁的为人 烂漫的诗意

——《韦其麟研究》读后

□ 张桃洲



《韦其麟研究》钟世华 编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当然,研究者最为关注的还是韦其麟诗歌对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运用和拓展,比如方焱的《叙事长诗〈百鸟衣〉》的独特意义在于“在表现民族风情、民族精神、伦理教化中注入生命气象”;莫奇的《重读〈百鸟衣〉》一文注意到了韦其麟诗歌基于民族文化元素的音乐美学:“似乎不是一幅幅迷人的劳动场景在我们眼前交替,而是一曲曲动人的创作历程及其与当代诗歌和其他少数民族诗歌的互动关系,以及围绕这些相关议题展开研究的总体格局和代表性成果。倘若说,韦其麟的亲历者角色和持久创作,让他和其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并见证了当代少数民族的发展历史,能够彰显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某些特征,那么这部论集就是对这些特征的全面把握和集中呈现,兼具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程光炜的《中国当代诗歌史》提到,在20世纪50年代,一批少数民族诗人以“群体”姿态引起瞩目,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当时与韦其麟一道亮相诗坛的,有巴·布林贝赫(蒙古族)、铁衣甫江(维吾尔族)、饶阶巴桑(藏族)、汪承栋(土家族)、包玉堂(仫佬族)等诗人;他们创作的《百鸟衣》《生命的朝花》《雪莲花》《虹》等长诗,以少数民族叙事长诗的诗坛炫光,构成了当代诗歌史上长诗创作的奇特景观。这些诗人和作品无疑是民族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共同铺就了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得以留存、延续和发扬的路径;将民族文化转化为诗歌创作的动力和资源,这些经典性作品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也丰富了民族语言表述。期待这一领域涌现出更多像《韦其麟研究》这样进行系统探究的著作。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